

批評與回應 《文化研究》第二十七期（2018年秋季）：154-158

在萬家墨面的時代：「動地吟」的文學行動

The Time of the Poor: “Earth-Shaking Recitation” as Literary Activism

張錦忠*

Kim Tong TEE

曾維龍的論文〈馬來西亞「後茅草行動」的華社變遷：以「動地吟」詩人群體為個案討論〉闡述的是1987年以來馬來西亞一群華裔詩人以現代詩朗誦會的形式回應社會變動，漸漸形成一個以文學介入社會的詩群。我這篇回應主要是補述或簡化曾文中的歷史脈絡，旨在彰顯「動地吟」詩群勇於投入實踐以文學與社會互動的「文學行動主義」。而朗誦詩的美學、有沒有詩意的爭議，恐怕不是這裏可以處理的。至於游川個人的詩創作的困境，以及馬華文學研究或批評的目的云云，沒有必要在「動地吟」的脈絡討論，本文避重就輕跳過，請讀者原諒。

一、事件：茅草行動

2017年底，張俊煥(Joon-Hwan Jang)導演的《1987：黎明到來的那一天》(1987: *When the Day Comes*)上映，影片以1987年6月韓國民主運動為背景，那場運動促成了韓國政治改革，也證明了更美好的世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。而對位處東南亞的馬來西亞而言，1987年也是個重要的年份：憲法危機開始，巫統黨爭出現，然後是教育部派遣不諳華文人員到華文小學任

* 張錦忠，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與哲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
電子信箱：tktong@faculty.nsysu.edu.tw

職，引起華人文化存亡危機感，華人團體與華基政黨遂舉行集會抗議，巫統青年團也號召馬來人反集會，一時種族衝突氣氛緊繃，馬哈迪政府於是在10月27日展開代號「茅草行動」的大逮捕，援引內部安全法令將一百多位反對黨人與異議人士下獄，並查封報紙，大開民主倒車。

對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來說，教育部派遣不諳華文的行政人員到華文小學擔任高職之舉，無疑是將手伸到華文教育區域去干預，暗含消滅華教的潛議程。華文教育向來為華社三大支柱之一（另兩大支柱為華人團體與華文報章），一旦華文教育面臨存亡危機，華社則失去一支重要的臂膀，華人文化就難免有覆滅之虞。馬來俗語說得好，「語言者，族魂也」(Bahasa Jiwa Bangsa)，這話用來表達華人彼時的感受也十分貼切。

二、文學：抒情馬華

1980年代的馬華文學——或者說，1970年代以降的馬華文學，早已在國家文學與國語霸權的運作下成為「離心與隱匿」的書寫。感時憂族乃宋子衡(1939-2012)、菊凡小說中人物所流露的情懷，到了1980年代初，更有像洪泉這樣大書特書對民族、家國、文化感憂的小說作者冒現。另一方面，寫詩的人如陳強華(1960-2014)、王祖安、傅承得，或比他們年長的游川（林友泉，1953-2007）、沙禽，他們對時代與社會現實的抒情回應，是我論述「馬哈迪時代的抒情詩人」時所檢視的對象（不過後來只寫了一篇論陳強華的），他們代表了「抒情馬華」的樣態。

其實，這樣的語境並不是馬哈迪時代才出現的。早在1969年5月發生的種族衝突「五一三慘案」之後，國家行動理事會短暫接管政府，還政於民後，政府厲行新經濟政策、獨尊馬來語與馬來文化，國家已向威權與馬來民族主義傾斜：「卜米主義」(Bumiputraisim)與「馬來主權」(ketuanan Melayu)成為大敘事與宰制話語(dominant discourse)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加強壓制左翼力量，除了將「五一三」種族流血事件歸咎於馬共分子煽動，發表白皮書譴責馬共之外，也查禁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，學會主導的「春雷

文藝大匯演」被迫腰斬，若干執委被捕入獄，重挫了華裔學生與青年「文藝介入社會」的行動，白色恐怖瀰漫於無聲處，甚至閱讀魯迅(1881-1936)也可能被當成是左傾的證據。許多年後，當年馬大華文學會執委姚麗芳撰文回憶往事，文章即題為〈於深心處聽驚雷〉，那當然是魯迅1934年那首著名的〈無題〉詩的典故，也指涉被噤聲的「春雷」。

三、「兩個後生」：游川與傅承得

林友泉生於臺灣，並不是留臺生。早年以「子凡」為筆名，詩作意象明朗、文字淺顯，題材生活化，有別於社會寫實的批判詩風。在他出道的1970年代初，臺灣鄉土文學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，其中現代詩論戰炮火隆隆，馬華現代詩也受波及，詩人開始反思本地現代詩的路向；譬如，梅淑貞、葉嘯、吳海涼即分別針對何啓良的《刻背》與天狼星詩社若干詩人提出脫離現實的批判。馬華現代詩因此轉向取材現實生活的詩風，而子凡正是這股擁抱鄉土直面生活現代詩潮的前鋒。他早期的詩受白萩等臺灣「笠」詩社詩人的影響，作品也多在《笠》詩刊發表——這是他創作歷程中的「臺灣關係」。到了1989年，他出版第四本詩集《蓬萊米飯中國茶》時，作者署名已經是「游川」了。從子凡到游川，他的詩更口語化，更樸實，簡短如匕首。

傅承得留臺期間，正是馬來西亞留臺生辦《大馬青年》、《大馬新聞雜誌》以凝聚國族意識、關心國是的時代，畢業那年(1984)在臺出版詩集《哭城傳奇》，1988年出版詩集《趕在風雨之前》時，1987年那場淒風苦雨已經過去了，詩集並沒有趕在風雨之前出版。這本詩集被視為馬華文學回應茅草行動的文本，另一文本為小黑的小說〈十·廿七的文學記實與其他〉。傅承得留臺期間，臺灣現代詩已呈現抒情、鄉土與後現代的多重奏表述，那是楊澤、羅智成、夏宇、向陽、陳克華、林耀德等後浪的時代。傅承得的《趕在風雨之前》裡頭就頗多薔薇學派的腔調。

四、「動地吟」詩群：文學行動

1988年12月，游川與傳承得在吉隆坡陳氏書院推出「聲音的演出：游川與傳承得現代詩朗誦會」，拉開了「動地吟」的序幕，儘管彼時並未使用「動地吟」一詞。那年正是「茅草行動」一週年，被捕的人慢慢出獄了，有些人關得比較久，例如民主行動黨的林吉祥。「聲音的演出」是文學行動——以朗誦賦予現代詩聲音，用「賽那風」(sinophone)的華語漢音表達這一代人的家國情懷、社會關懷、不滿與愛。當然，既是詩歌朗誦、聲音的演出，在馬來西亞的語境，日後「動地吟」跨出華語的疆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詩歌朗誦在臺灣的現代詩活動是常態，但不是馬華現代詩的傳統。馬華現代詩很少走出紙上向社會發聲，是相對沉默的藝術表現。這是我們談「動地吟」及其公共性的出發點。對推動現代詩朗誦者來說，「動地吟」不是低吟，而是登高一呼，從此現代詩朗誦變成當代馬華現代詩一種響亮的表述方式。曾維龍認為「動地吟」是一場文學運動，庶幾近之，不過我認為與其視之為文學運動，不如說「動地吟」實踐了文學行動主義(literary activism)，就像胎死腹中的「春雷大匯演」一樣。「動地吟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詩歌行動，讓詩人走出「詩人的房間」，將馬華現代詩帶上表演的舞台與空間，帶上街頭。

1989年游川與傳承得的「聲音的演出」不只正名為「動地吟」，還有了序詩（即〈無題〉），而且遍地開花，「動地吟」詩群在不同城市遊吟了起來。以魯迅的〈無題〉詩為朗誦會定調，也讓「動地吟」超越了朗誦會的定義，成為文化符碼，同時也遙指當年的春雷文藝大匯演——「於有聲處聽驚雷」。然後就是1990年的「肝膽行」。十年後，馬來西亞響起亞洲金融風暴、「烈火莫熄運動」等驚雷，2.0版的「動地吟」掛起「九九動地吟」的旗幟，一直到2008年的「動地吟紀念游川：詩曲朗唱舞蹈演出」——動地吟的重要推手游川在前一年逝世了。這個紀念會可說是2.0版動地吟的高潮，一個美麗而哀傷的分號；爾後的「動地吟」將進入沒有游

川的3.0版時代。隨著時間的增長，「動地吟」的參與演出者愈多，表演形式愈見豐富多姿。例如2.0版就加入了呂育陶、林金城、周若鵬、鄭雲城、曾翎龍等年輕詩人，3.0版的「動地吟2017: Gari, Tari ... Lari」更加多元，更多翻轉的表演，例如加入了鄧壹齡導演的詩劇。

從「動地吟」出現迄今，在過去三十年的時光裏，馬來西亞的社會、政治與經濟幾乎每十年都面臨動盪不安的局勢。曾維龍即據此指出「動地吟」「幾乎每隔十年即呈現一系列的演出」而將這個詩群的活動分為三個階段。「動地吟」扣緊歷史的脈絡，抒發時代的聲音，用詩歌來批評當前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教育與文化問題。這也是「動地吟」不僅僅是一個詩歌朗誦會，而是一場「敢有歌吟動地哀」的文學行動。這個文學行動既反映了社會進程中無公理非正義的現象，也以聲音演出提出抗議與批判，彰顯了文學的社會介入功能，值得書寫馬華文學史的人書上一筆。